读《论吴三桂残件》

左书谔

吴三桂，作为清王朝的叛逆者，在其发动反清的“三藩之乱”失败后，不仅其五族受株连、子孙丧命九泉，而且对有关吴三桂的历史资料，清朝统治者也作了清理，许多史料被禁毁，或剔除其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东西。官方如此，民间也不例外，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便是禁毁的重要手段。乾隆年间段昌绪藏吴三桂檄文事发被斩便是例证。正由于此，明末清初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吴三桂，其记载史料少得再怜。在此情况下，故宫档案馆所珍藏的《论吴三桂残件》①就显得甚为可贵。本文拟对这一档案残件作些评述，以就正于同仁方家。

《论吴三桂残件》不但无头缺尾，而且中间也有佚失。尽管如此，这件档案资料仍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为原始、较为全面的评价吴三桂的史料。它对吴三桂一生的重要活动提出了与清朝统治者截然不同的看法。现分述之如下：

一、对吴三桂借兵复仇的评价

崇颖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以百万之众，迅雷之速、摧枯拉朽之势向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于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宣告明政权的灭亡。受朝廷之命入援北京的平西伯宁远总兵吴三桂，兵抵丰润之时闻京都失陷的消息，他驻师丰润以观时局之变。由于李自成农民军未采取正确的策略招降吴三桂，而是收系吴三桂父吴襄及全家，以强硬的手段追赃拷饷，刘宗敏又强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等行为，加之身为故明旧臣的吴三桂，对农民军逼死崇祯皇帝有亡国弑君之恨，终于决然同李自成农民军决裂。当时吴三桂拥有的军队不过是四五万而已，要对付推翻中央王朝的李自成百万大军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吴三桂在其谋士胡守亮、方献廷的建议下，决定借兵于东土的清朝，于是便派出偏将杨珅、郭云龙前往清朝借兵。清朝大权在握的摄政王多尔衮受请而统十四万大军进军山海关，终成清，吴联军之势，山海关一战联军大败李自成，并且乘胜追歼，李自成虑北京难保弃城西走，多尔衮乘虚而入北京，奠定了有清一统之基。

对于吴三桂借兵复仇引清兵入关之事，后人多从清兵入关导致异族统治的后果着眼，对吴三桂予以讥讽与贬斥。故明旧臣杨士聪的评论最有代表性，其云：“呜呼！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姑潜匿焉，以徐观鹬蚌之持，亦未为大失也。乃束身来降，予以复仇之名。一战再战，贼虽两遁，而京师非我有矣。且东宫三王祸不旋踵，吴襄被戮，殃及全家，揆之忠孝，有何当焉”？②此论对吴三桂全面贬斥，时人也多循之。而《论吴三桂残件》与此相反，另有新论·其云：

“（吴三桂）致书绝桥，借兵殄贼，以报君桥之仇，以雪国家之难，以甦四民之困。揆此数行，千古之下可称大忠、大义、大仁孝之圣贤也。时人惟知时人而已，乌得而知吴君乎？

汝不知周公大义灭亲，及今数千载以来未有史传并时人有论周公之不仁义也。而日受清朝之封，构胡人之姻不获。已而将错就错，此数举者深得俊杰达时、圣贤顺天、智士行权之道也”。

此论与杨氏之论形成鲜明对比，一贬一褒泾渭分明。平心而论，两者均有偏激之处。杨氏之偏在于未能看到吴三桂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即同李自成农民军决裂后，吴三桂处于西有二十余万农民军进逼山海关，东有十四万满洲兵向中原挺进，众矢之的的山海关正可用“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必须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对此谈迁指出：“吴三桂之乞援建州（清），非其意也。建州告警在正月，又宁远内徙，边藩尽撤，建州捣虚无疑矣。三桂内绌贼寇，外怵建人，权其两害，势必东款以击寇。”③ 谈迁此论较之杨氏之论公允多了。《残件》之偏在于把借兵复仇抬得太高，把吴三桂称之为俊杰、圣贤、智士，未免也从相反的角度忽略了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特殊性，忽视了吴三桂极不情愿的主观与不得不如此的客观上的矛盾冲突。

二、对吴三桂覆灭永历的评价

多尔衮乘虚入京后，立即进行了一统全国的战争，李自成，张献忠的先后殉难，使农民军的反明起义逐渐转向了反清的民族斗争。桂王永历政权接纳农民军加入该政权内形成的“联明抗清”，就是具体的事例。在南明诸政权中，永历政权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政权也曾先后两次掀起反清高潮。即李成栋、金声桓反正后的反清斗争声势高涨。江南诸省汉人反正者纷纷。另一次就是李定国、孙可望等农民军余部加入永历政权后掀起的又一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然而，这一坚持十余年反清斗争的永历政权，却是被以吴三桂军为主力的部队打垮的。而且，永历皇帝也是被吴三桂擒获于缅甸、处绞于昆明的。

对于故明旧臣，吴三桂覆灭有恩于他们的朱明后裔建立的政权，他们当然会多加指责，责其忘恩负义，甚至在吴三桂起兵云南举旗反清后，清将尚善也致书吴三桂以覆灭永历相诘。其云：“王（平西王吴三桂）藉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不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④ 而《论吴三桂残件》则又有别论，其针对时人指责三桂覆灭永历之论云：

“惜乎，知其彼而不知其此，知其近而不知其远也！并不克穷其理之极也。大凡人非尧舜，不能无尤，况无尤不成圣贤。使吴君受闯贼之封，临敌对垒，不念明君，亲诛永历，议其大不忠是也。然永历之崩，系清朝之旨，在吴君诚心未忍为此也。因见时势不然，汉室江山悉被清得，明季气数毫无，仅仅止有吴君一营孤军，举目皆是清兵，由是势弱力微，即有万分尽忠保全永历，情如越鸡之伏鹄卵，势所不能。不但永历之不能救，即吴君亦自取死之机也。时人有何讪吴君也”？

《残件》此论，虽从相反的角度予以辩护，然而揆之史实的确如此。吴三桂发起”三患二难”并请求进军缅甸之议，也在清廷密谕洪承畴进兵缅甸之后，吴三桂出兵缅甸又是在清廷多次以旨令催进的情况下进行的；吴三桂擒获永历后，本拟槛送北京，而且他也答应永历送其入京，以便能葬其身于祖坟之地的请求。但当得到康熙不必送京都就地处绞之旨后，即将永历处绞于昆明篦子坡。吴三桂之所以如此听命，正如论中所云，是“势弱力微”所致。不过，《残件》所未察尚有一点，即吴三桂有“先除由榔（永历）绝人观望”之意⑤。他要

用永历的尸体取得清廷对他的信任，以便从事他的反清复明的更大活动。吴三桂的良苦用心既是如此，所以其所为难以被时人所理解。否则清朝统治者岂是傻瓜？！

三、对吴三桂复明之志的评价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后，不仅未能复明，反而自身受困于清。清朝以资助吴三桂兵力和配合其征战为借口，使吴三桂处于清朝八旗兵的监护之下。而且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了笼络措施，诸如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赐以四个满州夫人、给予优厚的俸禄以及尚公主于其子吴应熊等。吴三桂在作了复明的尝试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拒绝后，见自己的势力远不足以与清军抗衡，为长久之计，他接受了清朝的封号和优待，并驱兵进征山陕川云贵诸地。这看上去似乎吴三桂已经“降清”，而且已成为清朝镇压反清力量的得力干将。所以当时的故明旧臣以及后来的一些人，把吴三桂看作一个降清之人。对此《论吴三桂残件》不予苟同，其云：

“吾知吴君之心身虽居清，而其志念未尝忘中国，亦未尝不悯汉民困苦，尤未尝不欲尽忠孝仁义，以成万古之美名。惟奈时势不合，只得勉而权顺天道。在其本性未必乐忍心至此也”。

《残件》之论中用三个“未尝”，证明了吴三桂并未降清。但是，此论只注意到了吴三桂鉴于时势不合而勉强“权顺天道”的一面，而未观察到吴三桂并非仅仅消极的等待天时之变，而是在统一战争中招降纳叛，聚集其与清朝抗衡的力量。尤其是在镇藩云贵后，苦心经营那块地盘，使之成为反清的根据地。又收召奇才名家，结纳党羽。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举旗反清。所以，吴三桂未降清之论是颇有道理的。这一点连后来的乾隆皇帝都已论及。其云：“然其（三桂）筹画岂实为我国家哉？彼时已具欲据滇黔而有之之心。……三桂之必欲灭由榔实犹近日之阿睦尔撒纳之必欲灭达瓦齐。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必不能据准噶尔。则彼之为我宣力，皆所以自为也”。⑥乾隆以吴三桂灭永历这一事例来与准噶尔部的两个反清首领相比拟，以证明吴三桂所行乃其自为，虽有些牵强，但也说明吴三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问题。这一点与《残件》所论不是吻合了吗？！

四、对吴三桂反清称帝的评价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以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于云南，发动了反清的“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又称帝于衡州，建国号周，改元昭武。形成了南北二帝的局面。

对于吴三桂起兵反清，清朝统治者恨之入骨，所以康熙给吴三桂作了这样的评价：“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⑦仕清的臣僚们多循康熙之论，如抱阳生论曰：“桂，明季罪人，本朝逆贼，不忠不孝，何行可称”！⑧《论吴三桂残件》则把吴三桂的反清同其一直所进行的复明活动联系起来，高度评价了反清这一晚节。其云：

“大约凡人一生行事立业，譬如手弹相表，总在贵乎结局一着，以判胜败，以决传史后人之毁誉也。如人结局一事举之正，则无所不督其正，或有前愆，概隐而不毁”。

《残件》以此出发把吴三桂反清作为其传史之壮举，但是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以结局判其一生，以功掩过或以过掩功——是今日历史唯物主义所不足取的。

那么，既然吴三桂始终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又何以长达三十年之久才举旗反清？《论吴三桂残件》也有解释。其云：

“大志之士，图大事业藏之于胸中，谨言慎行，安肯显然令人预知乎？倘时势未及、计谋未成，致人先觉，不但事之瓦解，即虑身家性命所系，奚容不藏密得乎？所以《易》曰：‘机事不密，则害成’，此之谓也。况且，大志图大事建大业，又必须由渐而至，相时而动，因势而得，不可躐等。凡事欲速则不达，务要从容中道，以合古圣贤行豪杰大志大业之辙也”。

《残件》的这一解释初看起来似有为吴三桂辨解之意，然细细思之不无道理。试想山海关大战使吴三桂军损失过半，四五万关宁军只剩二万人。虽然吴三桂曾致书多尔衮“称颂他们忠实勇敢地帮助平息国家内乱，最后希望他们撤出中国”。为履行昔日借兵时的山海盟约，吴三桂还“奉送了酬劳品”。然而数十万大军进入中原、北京已在掌中的清朝统治者，怎肯唾手而弃到手的硕果，所以置山海盟约于不顾，断然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文的一手失败了，那么武的一手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二万军队何能与数十万（初入关时十四万，后又陆续增加）清军抗衡？所以“大批鞑靼（清）人进入中国，他已不可能战胜他们”，只有暗中聚集力量以待来日了。(〈意大利〉卫匡国：《鞑靼战纪》)此后吴三桂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既向清廷公开请示增加整编军队，又暗自私立个人武装，至康熙十二年（1673）吴藩起兵时已有数十万军队，有了能与清朝抗衡的实力，加之吴三桂的积极活动党羽四布，“时势”已及，所以起兵乃为必然。从这一点上看，《残件》之论是颇具情理的。

对于吴三桂称帝之事，清朝统治者与故明遗臣均作贬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僭位”，“大逆不道”，是因为吴三桂不遵臣子身份，竟然自立为帝。故明遗臣们大为不满，是因为吴三桂起兵云南之际，曾发布反清檄文言其“推奉三太子，水陆兵并发”。⑨但最终未见朱三太子即位复明，反见三桂自立为帝。所以，故明遗臣们多加斥责，甚至竟有以其“僭元昭武，拆昭字为斜日刀口，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戈也”，来诅咒吴三桂“贼亡无日矣”。而且，更有朝鲜史家李肯翊也评吴三桂自立称帝为亏。其云：“（吴三桂）三十年臣服清国，及白首之后，脱胡服而起兵云南，其事虽奇，而不立大明之后，自为僭号，名节俱亏，无复可论，与当初处义者，判若二人，甚可惜也”！⑪对此，《论吴三桂残件》从几方面论述了吴三桂称帝之事。

首先，《残件》认为吴三桂衡州称帝乃为必然。其云：“时势一至，天顺人归。及后吴君渐至帝位，更有自然之理。有不其然而然者，彼亦不知，人亦不知也”。

其次，吴三桂即帝位乃为天意。其云：“大抵人逢大难不死，后必有大福。而吴君生平之难不暇尽述。……昔者关外被胡人重伤其容；在秦境战贼不胜，意欲卷甲弃眷而奔，后反凯歌；至滇之磨盘山，不与虏王同危。即此三大难不殆者，此非清之气数，实系吴君福洪，而上帝不忍弃，以存吴君为后日中国创业之主也。在吴君尚然不自知，何怪乎时人”。

复次，吴三桂自立为帝无可指责，不必再立朱明后裔。其云：“（故明遗臣）怨吴君，憾胡人，必要中兴明朝。除不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及后日久群贤困苦，庶民流离，人人皆想吴君为帝共击虏人”。

《残件》之论未脱中国古代传统的君权天（神）授之观，这也不可苛求，因其毕竟是封

建枷锁束缚下的人，难能另有新论。不过其所云由吴三桂起兵云南到称帝乃是自然，以及吴三桂自立为帝也非大逆，是有可肯定之处的。

综观《论吴三桂残件》，我认为其对吴三桂一生活动还是涉及较广的。它抓住了吴三桂一生中三件大事（关外抗清；引清军入关与置身统一；发动“三藩之乱”）中的后两件，而这两件恰恰又是评价吴三桂其人中争论最大的，它从引清兵入关、覆灭永历、复明、反清称帝四方面论之，有许多不同世俗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研究、评价吴三桂也有某些启迪。然而，掩卷沉思之后，我觉得此档案残件的作者，恐是参与吴三桂“三藩之乱”亦或是吴三桂党羽或谋士所作，其立场是在吴三桂一边，处处流露出为吴三桂辨护之意。故此在某些方面也显得有些偏颇。但尽管如此，《论吴三桂残件》仍是研究、评价吴三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以上粗就之文，因限于水平，难免挂一漏万，是否较为中肯地作了评述，自甚难揣，诚望惠教。

---

①《明清史料》丁编，第十本。

②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版第38～39页。

③谈迁：《国榷》卷101。

④⑤⑥《逆臣传》卷1，〈吴三桂列传〉。

⑦《清圣祖实录》卷46，第12～14页。

⑧《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2。

⑨〈日〉石村点一：《元明清史略》卷4。

⑩刘健：《庭闻录》卷5，〈称兵灭族〉。

⑪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大明亡》。